

是规定了形式上必然为真的途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认识论与传统理解的笛卡尔意义上的认识论有了不同。按照笛卡尔式的理解,认识论是对思维活动过程的研究,是关于人们的认识活动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科学。这是根据心理学对认识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个体性的思维内容的研究。但知识论则是对知识的形式和条件的研究,完全不依赖于具体的知识内容即思维活动。应当说,知识论与认识论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关于思维活动的内容,而后者是关于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由于这样的条件是以询问知识的形式规定开始的,又是以探究知识的逻辑必然性为前提的,因而,知识论就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

这里对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区别并不是完全否认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深层意义上或在广义上说,认识论和知识论都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特征或抽象特征的研究。而且,只要是一种“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研究,就不可能是“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就是说,这样的研究一定是要超越经验的、物理的、个人的成分,进入纯粹思想的、具有共性的、必须用普遍概念表达的成分,这样的成分当然就不会是自然科学的内容,也不是意识活动领域的内容,而只能是关于纯粹形式的科学,即逻辑学。这里的“逻辑”不是指传统的形式逻辑,也不是指通常理解的对思维形式的研究,而是指对事物存在必然性的研究,是对事物之所以成为自己的自我规定性的研究。可以看出,这里所理解的“逻辑”其实就是形而上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认识论和知识论都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当然,更应当把逻辑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形式。

对逻辑的这种全新理解,势必直接导致我们重新解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以及作为所有这些分支之基础的形而上学。这当然不是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讲清楚的。仅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的追问就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特征:在这里,知识已不再被看作人类认识活动的概念化结果,而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用于表达自我的方式。应当说,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的追问,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问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本体论的反思方式。

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质

陈 嘉 明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知识论”,顾名思义,以“知识”为研究对象,因此它以知识的存在为前提。由于知识本身的种类、形态与内容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因而知识论对于知识的理解自然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在近代,成熟的知识形态主要有数学(主要是欧几里德几何学与算学)、牛顿物理学,因此它们构成了知识论思考的基本对象。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以数学为知识范本,认可天赋的先验知识的存在,将演绎推理解释为理想的知识方法,并以必然性和确定性作为知识的内在属性。经验主义者(如培根与洛克等)则以物理学这一经验科学为知识范本,因此,他们否认天赋知识的存在,突出归纳法的作用。不过在知识的属性上,仍然是与理性主义者一样,将必然性和确定性视为知识的根本属性。

近代知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休谟以“因果性”概念为依据,怀疑经验科学及其方法的确定性,从而否认经验知识的必然性。力图对这一挑战做出回应,以求重新奠定知识大厦之基础的是康德。康德哲学的宏伟蓝图,在理论哲学领域里进行着至少两项重要的革命,一是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以“存在”(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是“实体”,在莱布尼兹那里是“单子”)为对象的形而上学,改造为为知识提供逻辑根据、即认识之原理的形而上学。因此在康德哲学那里,形而上学与知识论是合一的;二是试图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派之中的合理要素整合起来,思考各种类型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学与哲学在知识类型上的共同性,并在有关知识的解释上进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将知识论从符合论改变为先验论。

康德这一知识论构想是建立在对知识的三重层次划分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最低层面的知识是经验性的知识,即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知识,它们的依据是“经验的法则”,所以亦可称为“应用的理性知识”。^{[1](P3)}第二层面的知识是自然科学中的“纯粹的部分”,即包含着“一切对自然的解释的先验原则的部分”;这一部分属于“纯粹理性的知识”,它们构成自然科学的“先验的法则”,亦即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或前提条件,从而也可称为“自然的形而上学”。第三层面的知识是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知识,它们来自于对数学、

自然科学中的这些“纯粹部分”，以及形而上学本身的反思。康德在类型学上将它们归属于同一类型的知识——先天综合判断，并从中剥离出它们构成的诸先天要素：广义的纯粹理性（包括纯粹直观、先验想象力、先天统觉等），及其先天具有的范畴和由范畴引出的综合判断原理的体系。这些要素构成一切知识的根据。这种为知识寻求根据的努力，在黑格尔那里则表现为一种概念的逻辑。一些根本性的范畴（本质、现象等）成为知识的根据。按照黑格尔的哲学，不论是人们的思维，或是自然界本身的运行，都是依据这些范畴而进行的，都服从于范畴所展现的本质与规律。

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回到经验论，知识论也如此。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经验的，它们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其中的“确证”这一条件，它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1963年，一位名叫葛梯尔（Edmund Gettier）的教授发表了一篇仅有两页篇幅的论文：《确证的真信念是不是知识》，针对西方传统的知识的三元定义（即知识必须满足真、确证与相信这三个条件），提出了后来称为“葛梯尔反例”的两个反例。这两个反例对西方知识论提出的严重挑战在于，即使满足了知识的三元定义，其结果也可能仅仅是偶然为真的，因此也算不上是知识。^{[2]（P54—56）}

对葛梯尔反例的回应可区分为“确证主义的”与“非确证主义的”。前者用加强确证的条件的途径来解决，要求根本性的论证和推论都不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或假定之上。“不可败性”理论是这种解决方式的一个代表。它认为葛梯尔反例的实质在于认识者是从虚假的信念中推出它的合理的真信念，因此它对知识的定义所强化的条件是：主体S相信P的理由不应当包括任何错误的信念。后者则要么寻求用增加知识条件的做法来解决，要么用完全替换知识条件的做法来解决。诺齐克的“真理追踪论”寻求的是第一种做法，他为知识的三元定义所增加的条件是：“如果P不是真的，S就不相信P；如果P真，S就相信P。”诺齐克希望用这两个增加的条件来保证知识只能是确证的真知识，而不允许存在侥幸的认识。戈德曼的“因果性”理论等寻求的则是后一种方法，即用完全替换知识条件的做法来解决葛梯尔问题。他认为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信念与使信念为真的东西（事实）是不同的，因此认识者所相信的东西并不是事实，并且它所推论出的东西纯粹是一种巧合。为此，戈德曼强调的是作为原因的事实与作为结果的信念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于知识P来说，事实P应当引起信念P；反之，假如某一信念并没有因果地与相关的事实相联系，它就不是知识。

除了对知识条件的研究之外，当代知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确证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主要形成两大流派，一是“内在主义”，另一是“外在主义”。内在主义断言信念的确证完全是我们心灵“内在状态”的功能，是一个心灵内部的活动过程。这表现在信念的确证是由它与其他信念或理由的关系决定的，因此确证是由心灵活动按照一定的认识规范（包括强调认识者的责任）所产生的，并且这种心灵活动的各个要素（感觉、直观、信念等）都是可以通过内省或反思加以把握的。外在主义则主张与信念的确证相关的不是内在状态，而是主要在于与外部事实的联系，以及产生信念的过程与方法的可信赖性，如正确的知觉、推理等过程。如果某一认识过程是可信赖的，这意味着它具有较高的真的比率，那么它就可能使形成的信念成为确证的。

就两者的比较而言，内在主义属于比较传统的思路，将知识的获得与确证归结为意识的内在行为，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而外在主义另辟蹊径，寻求从信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或信念产生的可信赖过程中获得知识的确证性的根据。但不管是何种主张，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为知识及其确证寻找有效的根据，这与近代知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这表明知识论研究不论其问题的提法或论证形式作何变化，其实质依然有其同一性，都是寻求把握知识的根据，即知识需要满足的各种条件。

反观中国现代的知识论研究，在可谓风毛麟角的原创性著作中，造诣最高的当属金岳霖。他的《知识论》一书以“理解知识”为宗旨，详细地论究了知识论的各个问题域，如知识的质料、认识的诸种方式、认识的关系与性质、因果范畴等熟悉的知识论内容，直至自然、真理和语言等本属形而上学或语言哲学的东西。金岳霖总是尽量地挖掘、使用中国哲学的语词，如“能”、“所”、“理”、“式”等等，来使知识论的概念与语言中国化。不过我觉得该书的一个最大的缺憾，是它并没有一种明确的问题意识，因此未能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明确要解决的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狄尔泰的解释学提出要解决的是“人文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要解决的是“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那样，从某个根本性的问题入手来进行思考，并围绕着这一问题产生一整套系统的知识论。我想，金岳霖著《知识论》的这些得失，对于我们反思知识论的问题与实质，亦会是有所裨益的。

参考文献

- [1] 康德.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2] 陈嘉明. 确证与知识——当代知识论引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

傅永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 济南 250100)

人们所熟知的关于知识的观点是现代性的产物。康德最完整地表达了关于知识的现代观点, 他要求一切能够称得上知识的判断都必须具有客观有效性或者普遍必然性, 明确地将个人的主张、意见、偏见、经验、情感、常识等主观性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 以便从逻辑上把普遍性赋予知识, 从而简洁地把知识的普遍性要求表述为一种知识陈述, 即一切能够称之为客观知识的逻辑判断, 必然同时超越各种社会和个体条件的限制, 能够得到普遍的证实并被普遍接纳。知识的这种属性决不会随着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性别、种族等的改变而改变, 因而是先天的、绝对的。康德的这个规定在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普遍的科学陈述之间划定了严格界限。科学陈述具有中立属性, 与“文化无涉”, 是纯粹经验和理智的产物。要获得科学陈述, 就必须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 搁置或“悬置”认识主体所有的观念, 直接面向“事物本身”。

这种关于知识的观点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判断, 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判断。就像斯蒂文·塞德曼指出的那样, 人们从“科学视角”和“道德视角”来区分可能拥有的有关社会的知识。那些从“道德视角”述说的社会知识更像讲述一些故事。讲述者更多地扮演着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从自身的情感、生活世界和价值认同出发阐释或批判一些社会事象, 其职责不是揭示社会行为的基本意义和存在法则, 而是将社会现实的起源、意义以及可能出现的未来结果整理成社会叙事。因此, 从“道德视角”述说的社会知识主要是把自己理解成为一项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事业, 与其说接近科学, 不如说更接近人文, 是一种更看重价值判断、表达一种社会关怀、专注一种社会责任的实践。严格说来, 它们就不能被称作知识。作为获取这类知识的主要方法, 社会批判和批判诠释就没有知识建构功能, 相反, 由于意识形态介入社会批判和批判诠释之中, 使得社会批判对社会所进行的反思缺乏公共权威, 失去了公共信任。

如果说有可以称得上是“知识”的社会科学, 那也只能是从“科学视角”介入的社会研究。从“科学视角”研究社会, 目的是将研究者积累的大量经验研究成果汇集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 提供一种关于社会行为的整体图景, 用普遍性法则、统一性原理和创造理论性整合在整个学科内建立概念和经验的一致性。任何一门想成为“知识”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有这样两个任务: 统一社会知识和论证社会知识。如何完成这两个任务? 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相信只有坚持实证的社会研究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 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 才能建立起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知识。实证模式的社会研究以一套所谓严格的验证程序和研究准则奠定了其作为社会真理唯一权威语言的地位。它所倡导的原则, 如相信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为不用演绎的社会基本现象, 相信可以用“价值中立”的语言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以及反对在社会研究中置入价值因素, 等等, 几乎成了决定一门社会研究的结论能否被称作“知识”的简单而又惟一的标准。这样, 社会研究者就必须抛弃生活世界, 而沉迷在概念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灌木丛中。结果, 实证的社会科学创造了一个与真正的社会相隔绝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社会研究彻底离开了公共生活, 文本分析取代了社会分析, 建构综合性抽象理论优先于社会批判。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要求把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划分开, 防止在研究中置入价值。一种追求对社会进行纯粹事实描述的知识活动必然排除社会批判方法。

所幸的是, 这种用科学语言表达自己思想以提高自己思想权威性的时代, 随着后现代征候的出现, 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大变化首先发生在知识观上。为现代主义者所熟悉的、描述知识特征的术语如“普遍性”、“必然性”、“价值中立”等在后现代知识定义中不见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报告的后现代知识状态是这样的: 所有新近科研分支都同语言学有关, 诸如电脑语言、信息传播、电子控制论、翻译与数据库技术, 这意味着大规模将知识移入可操作的输入输出渠道, 并按效益原则废弃那些不可变为数字信码的知识成为可能; 由人脑进

电脑的知识外在化,除了便于它作为商品同生产交换系统并网,还促使知识者道德淡漠并奉行操作伦理,结果将导致知识与权力的恐怖整合;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狂欢现象并列,前沿科研领域纷纷呈现中心消散、规律不齐、验证有限等非稳定随意态势,而科学共同体不再关注已知的增加,却专心生产未知。

由此可以推断,在后现代境域,知识失去客观性属性,只拥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品质。一般所说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的认识绝对不是呆板的主体对客观世界直观的、理性的反映过程,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就像哈贝马斯期望的那样,真理概念是由共识构成的,而共识是由参与讨论的人在无内在、外在制约下参加讨论所达成的。在这个形成共识的对话交往过程中,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有的生活经历会发挥重大作用,影响共识的形成,于是,知识被情境化,所有的知识只具有局部的、不确定的或境域的特性;这些局部存在的和境域的条件不会对知识形成造成干扰,反而是知识形成的前提,同时也是知识能够被理解的前提。总而言之,知识既不是对世界的“镜式”反映,也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与“揭示”,知识成为人们理解事物及其自身关系的一种策略,并且,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各种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它最终会化身为社会规范的间接组成单元。

后现代知识观为在社会研究中坚持价值介入、批判诠释的非实证人文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人们清楚地看到,对社会知识的追求不仅不排斥社会批判,而且恰恰与对社会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换言之,社会研究必然蕴含着对相关社会现象的批判。做出这个断定的直接依据在于,我们是在“我与你”的交往关系中确定我们理解事物及自身关系之策略的(即获得知识),而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研究的对象即社会事实,也决不是纯粹的事实。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存在的,与特定价值相关的事实或者说是某种意义复合体。因此,我们必须在对话中完成对有特定语境意义的社会事实的理解。为此,理解者必须在自己的诠释活动中优先引入反思意识。在反思关系中,被理解者的语境只存在于理解者的视野中。理解者试图通过与被理解者的对话,了解理解者的境域与视野,然后反过来用被理解者的境域与视野去考量自己的理解境域与视野,以期提出一个“超越传统本身的联系”的新的“关联体系”,把“以前传统的片断,融进直觉的把握的普遍的历史总体”,在对话双方不断的视界融合中走上一个新台阶,使对话双方消释自己独特的语境而从属于新的意义的生成。由此可见,理解的有效性取决于对理解前见的批判与反思,而知识的最终建构成功也取决于诠释学经验下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否进行彻底。创造性阐释使得社会知识在社会批判视野中得到了独特的诠释理解(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诠释学开发出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诠释学,特别是为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深层诠释学”所提供的批判机制,已成为社会批判方法的核心所在。哈贝马斯把诠释学的理解和对社会制度的剖析联系起来,为意识形态批判设计了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关联系统。深层诠释学即是批判反思的科学,它是对所有批判的社会科学所作的一种哲学理解模式,这种批判将生活实践和科学相联系,目的是唤起人们的自我反思能力,鼓励主体追求解放。

Written Statements on “Western Knowledge Theory”

Abstract Western knowledge theory is one of the hot arguments in the present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n terms of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knowledge theory has covered the changes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theory to the theory of survival practice: western knowledge theory very apparent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etaphysics; Philosophers focus their main research on the basic features of knowledge, the conditions for knowledge to be possib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terns expressed by knowledge and the real world, rather than on detecting the thinking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gaining knowledge and the final patterns of knowledge. These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s of modern knowledge theory, but indic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knowledge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At the time being, as an obvious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knowledge theory, “metaphysics” has been criticized and abandoned without mercy as analytic philosophy dominates as the mainstream of philosophy. Efforts to seek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for knowledge are devalued as of no sense. Philosophy and knowledge theory have returned to empiricism. Nevertheless, efforts of seeking knowledge foundations are ongoing in knowledge theory, although the foundations manifest in sorts of conditions, including truth, real evidence, faith, etc., and in particular, “real evidence” is the core of the contemporary knowledge theory.

Key words: Western Knowledge Theory; Theory of survival practice; Real evidence

[责任编辑 全成]